

五角丛书

85380

谈大正 刘绍春编著

杀尽贪官

WU JIAO



NEW! 101



五角丛书 •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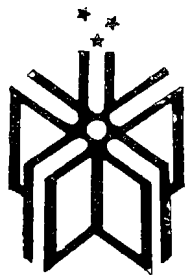
举制、大动

、低薪制和科

断足、腐化根由

故事、剔筋、剥皮、

一个儒生腐化变质的



五角丛书

杀尽贪官

谈大正 刘绍春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责任编辑：戴俊

封面设计：陆震伟

乘 尽 贪 害

谈大正 刘绍春 编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4.125 字数 93,000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400册

ISBN 7-80511-446-3/D·4

定价：1.45元

登记证号：(沪)104

作者的话： “杀尽贪官”与杀不尽的贪官

出身贫苦、造反起家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自幼饱尝元朝官吏的压榨欺凌之苦，恨透了贪官污吏。他在登基掌权后，立即大刀阔斧地整肃官吏，提出“杀尽贪官”的口号，下令：“凡官吏贪赃满六十两者，一律处死，决不宽贷”。他以挑筋、断指、削膝盖、断手等酷刑对贪官加以严惩，甚至推出“剥皮实草”的极刑——把那些被判死刑的贪官拉到“皮场庙”去生扒活剥。而且剥得巧妙残忍，整张人皮完好无损。皮剥下后填上稻草、石灰，做成“臭皮统”，挂在贪官任职衙门的公座之旁，让后任官吏办公时触目惊心，以为警戒。

其刑罚可谓严酷，其用心可谓良苦。这些做法，在朱元璋当世，确实收到一些震慑效果，但也未能根绝贪污现象。朱元璋晚年时慨叹：为何贪官这么多，早上杀了，晚上又有人犯罪？朱元璋死后，更是人亡政息。明成祖以后，又有宦官得势干政，官场腐败，日甚一日，直闹到明末危机总爆发、人民铤而走险，崇祯皇帝煤山自尽，明王朝覆灭为止。

清代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个皇帝有鉴于“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历史教训，惩治贪官同样非常严厉。然而也未能阻止他们身后的清王朝江河日下。乾隆皇帝 86 岁时还杀了伍拉纳、浦霖等几个大贪官，很为自己在退位前夕破了这个大案而得意。可是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是，乾隆派去审理此案的军机大臣和珅——一个长期受乾隆宠幸的百官之长——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贪污之王”。精明的皇帝对和珅

的昭彰劣迹闭目塞听，毫无察觉。乾隆一生热衷于抄贪官的家，可抄出的巨额财富绝大部分都送到了“内务府”（管理皇室财产的“内库”，“国库”是“户部”），即流进了乾隆私人的腰包。难怪有人说：“乾隆本人就是最大的贪污犯。”这一切充分表现出皇权专制、“人治”社会的严重弊端。

中国历史上，大部分封建王朝的初期，官吏比较廉洁。到了王朝末期，却无一例外地官场腐败成风，土地兼并惊人，最后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或少数民族入侵。这样的过程，每二三百年重复一次。为什么贪官污吏杀了一茬又生一茬？为什么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会有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这两者有什么内在联系？这是广大读者感兴趣并希望找到答案的问题。在对这些问题作出笔者自己的回答的同时，我们将围绕本书主旨对中国传统社会独特的结构进行解剖。

本书编写时吸收了史学界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借鉴了一些新的研究方法和新的概念，具体运用于对中国“贪官现象”的探讨。在写作体例上我们也作了一点大胆的尝试，即微观与宏观相结合，讲历史故事和理性分析并重，以适应读者口味。

由于水平有限，本书资料和理论上的挂漏和不足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目 录

1	作者的话：
	“杀尽贪官”与杀不尽的贪官
1	蛆虫们
1	千年一瞬间：贪官略述
4	文人雅士与贪污犯
11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
14	清代大官倒
19	封疆大吏贪污案
24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31	贪污之大王
38	阶级根源
40	腐败的原因
41	社会结构
46	儒生阶层
50	封建特权与低薪制
53	一个儒生腐化变质的故事
60	冗员滥吏的膨胀与官僚主义
63	后果：动乱与崩溃
67	反腐败
68	朱元璋的“剥皮实草”
73	康熙皇帝的“治国秘诀”
79	雍正皇帝的“抄家术”
84	乾隆皇帝的“索命追财”
88	效果：人亡政息
94	千年梦魇：
	除不尽的贪官和周期性动乱

95	官吏考核的无效与变法的后果
101	新贪官的出现
104	旧王朝、新王朝
112	新王朝的腐化
115	历史的光荣与历史的悲哀
121	结束语

蛆 虫 们

“千里做官只为财”。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当官的贪污受贿是人们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但要成为特大的贪官，需要特大的权势。由于封建专制制度中皇权至上，一个官吏的荣辱生死系于皇帝一人之手，所以要成为具有特大权势的大官，必须得到皇帝的特殊宠信。历史上那些家财亿万、奴仆成千的大官僚，如汉哀帝时的董贤，唐代的郭子仪，北宋末年的“六贼”，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无一不是深受皇帝宠幸的大臣。即便是中下层的贪官，也必须通过投靠大官，裙带联系，结成有权有势、广泛而牢固的社会关系网，然后才能放胆贪污。

“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在官位崇拜渗入民族心理的国家里，以权谋私成为封建社会生活中的“金科玉律”。有权就有利，先当官后发财，当官才能发财。贪官们巧取豪夺、侵吞社会财富的手法极多，可谓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水银泻地，无孔不入”。

千年一瞬间：贪官略述

贪官现象在中国源远流长。《左传》载有春秋时贪官们的行贿受贿之事；《韩非子》描绘过战国时贪官的举止行状；《史记》中记有汉代贪官的贪鄙行径。其后各代，贪官污吏，不绝于史。一般说，凡是经过农民大起义建立的新王朝，由于革命风暴对贪官污吏扫荡比较彻底，新王朝开始时的官吏比

较廉洁，反之，那些在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新王朝，由于对旧势力触动不多，其吏治一开始就比较腐败。而那些历史上穷奢极欲的昏君，他们本身就是全国贪官污吏的总头子。

西晋是在东汉末年割据基础上统一起来的，距离大规模农民战争已有八十多年。以司马氏为首的西晋统治者，形成了庞大的贵族集团。晋武帝依靠这个集团取代魏室，因此他上台后尽可能满足这个官僚贵族集团的敛财和权势要求。西晋的大官几乎都是魏世以来司马氏的元勋及其子弟。这些官僚惯于骄奢佚乐，贪婪腐化。他们侵吞、搜刮国库和人民的大量钱财，挥金如土。太傅何曾和司徒何邵父子，每天日常饮食费用高达一二万钱。

当时，在京都洛阳有三个出名的大富豪全是大官。一是掌握禁卫军的中护军羊琇，一个是晋武帝的舅父、后将军王恺，还有一个散骑常侍石崇。石崇听说王恺家洗锅用饴糖水，为了显示自己阔气，就命厨房用蜡烛当火烧。王恺为了炫耀家富，在家门前用紫竹丝编成屏障，夹道四十里。石崇马上用彩缎铺路五十里，把王恺比下去。

王恺不服输，向外甥晋武帝求助。晋武帝觉得这种比赛很有趣，就把宫中收藏的一株两尺多高的珊瑚树送给王恺，助他一臂之力。于是王恺特地把石崇和一批大官请到家中吃饭，然后端出这株枝条匀称、色泽粉红的鲜艳珊瑚，自我夸耀。谁知石崇看了以后，在一旁冷笑，随手抓起案头一支铁如意，“咣”地一声把珊瑚砸碎。

人们大惊失色，却又见石崇的一批家人抬上来十几株珊瑚树。其中三四尺高的有六七株。这下王恺方知石崇家财富比他不知多出多少倍，只好低头认输。

石崇的钱如此之多，超过他历年的薪俸无数倍，他何以致富呢？

石崇当过多年荆州刺史，曾竭力搜括民脂民膏，干过许多见不得人的勾当。每逢外国使臣或商人经过荆州地面，

石崇就派人敲诈勒索，有时甚至派人公开杀人劫货。由于他是朝廷命官，加上世道混乱，谁也奈何他不得。就这样一个大贪官、大强盗成了当时最大的富豪。

隋朝也是在割据的基础上统一起来的王朝。隋文帝登基后不愿“减功臣之地以给民”，又赐给大官僚大片土地。史载隋文帝时“强宗富室，家道有余”，也就是说贵族官僚和地主都很富有。而农民自耕的土地很少，还要承担繁重的赋税和徭役。

接下来隋炀帝又是个不知爱惜民力和奢靡腐化的昏君。在他统治下，地主加紧剥削，贪官污吏比比皆是。他不断征发农民掘长堑，筑西苑，营洛阳，缮离宫，伐木造船，供他南下巡游。隋炀帝每年远出巡游，从行的有大批士兵、官吏和宫女，大业三年（607年）的一次巡游，随行人员达五十万人。沿途各郡县要负责整修道路，还要供应最精美的食品。为了供隋炀帝挥霍，很多郡县贪官酷吏强迫农民预交几年的租税。贪官们也乘机大肆中饱私囊，逼得人民怨声载道，不久终于爆发了农民大起义。

宋太祖赵匡胤是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做了皇帝的。他上台以后对于武将不大放心，搞了“杯酒释兵权”，夺了他们的兵权。对官吏的薪俸却特别优厚。他对官吏的贪污不以为意。他说：“一百个儒生官吏贪污造成的危害，不如一个武将拥兵自大。”只是由于唐末动乱有效地杀伤了中原地区的贪官污吏和豪强地主，所以局面尚比较稳定（四川例外，五代时期“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所以贪官、豪强势力大，引发了北宋中叶的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但到了北宋末年，皇帝宋徽宗又是个昏君，他尽情追求腐朽生活，且又根本不懂国事管理。徽宗手下出现了一大批著名贪官，其中蔡京、朱勔、王黼、李彦及宦官童贯、梁师成这六个人货赂公行，党羽满朝，史称“六贼”。

宋徽宗喜欢吃喝玩乐，贪官们就挖空心思，迎合圣意。

他的亲信宦官童贯替他到苏州、杭州征用上千名工匠，每天制作象牙、牛角、玉石雕刻的各种酒器供他玩赏。后来玩腻了，就改换奇花异石调口味。蔡京、童贯为了讨好宋徽宗，派苏州人朱勔到苏州办起一个“应奉局”，养一批差官专门到老百姓家搜罗花石。百姓家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应奉局中官吏经常假借机会进行讹诈，这在当时臭名远扬，无人不深痛恶绝。

南方睦州青溪（现在的浙江淳安）出产各种花石竹木，许多百姓以此为生；朱勔应奉局常常派人去搜括花石，不但断了百姓生路，而且动辄为了移花搬树毁墙拆屋，弄得许多人倾家荡产，流离失所。搜括来的花石被装上大船运送到汴京，河中船只往来穿梭；民伕为运送花石日夜奔忙。每十船组成一纲，叫“花石纲”。

花石纲一到汴京，宋徽宗马上给朱勔提官升职。花石纲越运越多，朱勔的官越来越大。达官贵人都来讨好朱勔，送金送银送珠宝。人们都说朱勔的“应奉局”成了小朝廷。朱勔的搜括骚扰行径终于引起了南方农民的愤怒，他们在方腊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

明朝之前的元朝，其官吏的腐败酷虐也十分惊人。据《元典章》记载，“滥官污吏夤缘侵渔；科敛则务求羡金，输纳则暗取折耗，以致滥刑虐政，暴敛急征，使农夫不得安于田里”。正如元末民谣所传的，当时是“官法滥，刑法重”，“人吃人，钞买钞”，“贼做官，官做贼”。到末了，无一例外地引起了人民的起义造反。民众愤怒的声音是：“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

文人雅士与贪污犯

严嵩是明代嘉靖年间的谨身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明代取消宰相职位，设内阁大学士辅助皇帝办公，因而大学士

又称为辅臣。大学士按地位高低分首辅、次辅、群辅等。严嵩在内阁是首辅，人们习惯上称首辅为宰相，也就是说，严嵩位极人臣，权势炙手。严嵩一生受嘉靖皇帝宠信，权倾内外，可是在晚年时，由于过于跋扈，引起群臣怨愤，终于连皇帝也对他不满。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他被皇帝致休（强迫退休），他的儿子严世蕃也被捕入狱。不久又抄家。尽管严嵩已将部分财产转移，抄家时仍抄出黄金三万两，白银二百万两，土地、房产难计其数。仅北京附近有庄田一百五十余所，南京、扬州有良田美宅数十所，至于他原籍袁州一府四县的田地，十分之七都是他的。此外还有他到处勒索来的大批价值昂贵的珍宝、文物。他贪污时的胆子之大，手法之多，令人咋舌。

根据徐阶、邹应龙等官的揭发和查实，严嵩经常贪污军饷。明朝时，蒙古人退出北京，可仍在北方威胁明朝的安全。因此皇帝经常要拨出大量军饷维持北方的重兵布防。严嵩乘机克扣自肥，造成士兵强烈不满，边防常出现溃逃与哗变事件。严嵩自任内阁首辅以来，权重一时，官员们的沉浮荣辱，很大程度上系于严嵩之手。严嵩乘机敲诈索贿，求官的人络绎不绝地向他进贡。后来，为了省去讨价还价的麻烦，严嵩干脆按官位品级高低订了一份价目表，如文官州判（副州长）三百两银，通州（副知府）五百两，武官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吏部号称六部之首，所以售价更高，吏部郎中、主事三千两。尽管如此，求任郎中、主事之职的人还是很多，于是“调整价格”，又猛涨到一万三千两。当时有个乡村教书先生考上了举人，但总也轮不上他当官，后来他探知玄秘，连忙送了二千二百两银子给严嵩，这才把山东临清知州的美差弄到手。

想当官要给钱，想升官也得给钱。礼部有个小官叫项治，因为不学无术，上司不赏识，所以总是得不到升迁。他多方设法，筹措到一万三千两银子，全数送到严府宅院，严嵩

马上就把项治从礼部调到自己兼任尚书的吏部，任他为主事。严嵩义子赵文华，督师到浙江抗击倭寇，并无建树，回家时却送给严嵩白银二万两，金丝金屋一具，二十七位娇妾每人金翠髻装一套，还说是“薄礼”，“不成敬意”。严嵩收进“薄礼”，马上向嘉靖皇帝举荐升任他为工部尚书。

如果是被皇帝罢了官的，现在又想复官，那就更得破费了。当时有个小武官叫李凤鸣的，因偷逛窑子违反军纪被罢职，他送了两千两金子给严嵩爱子严世蕃，不久，李凤鸣就被重新任命为蓟州总兵官。还有一个仇鸾，也是个武官，因私吞军饷太多被揭发罢了官，为了复职，以重金馈送严嵩，结果他重又当上了当时军事重镇宣府、大同总兵官。

想升官要送银两，要保住官位当然也得送银两。明太祖以来就有一套对官员的考核考绩制度，隔三四年进行一次全面考核，政绩突出、百姓称颂的可以升官；劣迹昭彰、众口叱骂的要降职或撤职。这本是一种较好的制度，可到了严嵩手里，则成了他发财的工具。每到考核年头，便是严嵩的“丰收之年”。只要你多少送些，保管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如果你自以为干得还不错，不愿“拔毛”，那十之八九要被以“浮躁”、“才力不及”、“老病”等借口降职甚至罢官。文武百官为得个平安无事，每年都按例送些金银到严府，自称“问安”。尤其到考核之年，每天到严嵩府邸送金银财货的人络绎不绝，相望于道。到了严府，还得排队等候。

严嵩权势之大，连皇亲国戚都要买三分帐。诸王有事上奏，奏章要通过严嵩才能到达嘉靖皇帝手中；如果不老实送点东西，奏本根本无法上达或迟迟不能上达。要是他在皇帝面前再说上几句不好听的话，那你的要求休想达到，说不定还要遭殃。嘉靖皇帝的三儿子朱载堉（后来的天子——隆庆皇帝），当时眼看王府的日常开支快没了，总不见亲王禄米俸银发下来，一问下面办事的，才知道关节出在严嵩那里。于是他居然不得不叫管家把仅有的一千五百两银子送

进严府去，才领到户部发给的王府禄俸。伊王朱典因事犯了大罪，为了保命，不惜家资，赶紧送了十万两白银给严嵩。严嵩的儿子工部侍郎严世蕃在工部大堂上不无得意地说：“天子的儿子也得给我家送金送银，谁还敢不送？”听到的人都私下说：“这家伙真胆大包天！”

严嵩的财路宽广，家中金钱成堆。严府的一个门卫曾出来说过：“我从偏屋看过去，正堂之内金、银、珠宝、玉器狼藉一地，房里放不下了，就挖了一个几丈见方的大地窖，里面也堆满了金银珠宝！”

严嵩在搜括金银的同时，也多方搜括田地。严嵩自己说他家原是贫寒，没几亩田地，可等他做了内阁首辅，没几年已有一百万亩之多！在京师、在南京、在扬州和他的老家江西袁州，都有他严家的田地，几乎是半壁江山了。他受宠于皇上，是称权相，凭自己炙手可热的权势巧取豪夺。他派家人在家乡袁州一带强占百姓田地，有一次，严嵩的家人看上了一块三千亩的肥田，报告给严嵩，严嵩父子巧为设计，逼迫田主“自愿”将这片土地“投献”给严家。对一些小有权势的人的田地，严嵩就花些银子“买”，这种买当然不会是公平交易，如能支付个十之六七的银子就算是田主碰上好运了。卖田的人尽管不愿意，也只得自认晦气。严嵩的一些远房亲戚也常借严家的权势用低价强买别人的田地，这在法律上可是不允许的，但有严嵩在朝廷，谁也没有办法。有一次，江西巡抚想要惩办严嵩的一个用低价强买人家田地的远亲，这位远亲赶紧向严嵩求救，严嵩只一封信就叫这位远亲消了灾，免了祸。明朝时候，国家有许多的官田，严嵩侵占起来就更不费神了。一次，他的家人看中省城做仓库一带的地方，没多久姓官的东西就改姓严了。

古时候，当官人家的田地是不用向国家纳税粮的，严嵩有一百万亩土地，又不向国家交一斤一两的粮食，他的家业能不兴旺发达么？严世蕃曾夸耀说，他严家是“天下首富”。

有钱便好挥霍，严嵩父子过着极端奢侈淫荡的生活。严世蕃更是美妻爱妾，学着皇帝三宫六院粉黛三千的样子，分屋列居。他每天驾幸其中的几个房间，或将娇妾们召集在一起歌舞作乐。看着一群娇媚艳丽的女子围着自己转，严世蕃不无得意地说：“皇帝爷未必有我乐！”

在严嵩罢官以后，徐阶接替他升任内阁首辅。过去徐阶受严嵩排挤，早已怀恨在心，现在自己到了台上，该是严家还帐的时候了。徐阶亲自主持审理严嵩父子案，最后拟定严世蕃的罪状，说他聚众谋反，还要东投倭寇，北引蒙古大虏，推翻明朝，妄想自己当皇帝。并写上“事已勘实，证据确全”，这当然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了。嘉靖皇帝阅后大怒，下令立斩严世蕃，将严嵩削籍为民。

从严嵩一生来看，他确是个虚伪奸诈的贪婪之徒，可是这种人怎么会取得嘉靖皇帝的高度信任，一步一步爬上内阁首辅的高位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履历。

严嵩原是进士出身，任翰任院编修。在这段时间内他曾因病在家休养几年。但他休养期间仍赋诗填词，出过一本《钤山堂诗抄》，这为他博得了文名。在此同时他还钻研历史，探讨君臣治国治人的权变之术。待他病愈出山时，适逢嘉靖皇帝朱厚熹登基。嘉靖素喜舞文弄墨，早就听得严嵩文名，登基后提拔严嵩为国子监祭酒，后又改任礼部侍郎，主管国家的大典和皇家祭祀工作。嘉靖常把严嵩叫到宫中谈诗论文。

嘉靖七年（1528年），朱厚熹派新任礼部侍郎严嵩去为他生身父亲的墓换上兴献皇帝的新墓碑。原来，世宗朱厚熹是武宗朱厚照的堂弟。由于朱厚照没有儿子，他死后皇冠就意外地落到了朱厚熹的头上。朱厚熹接位后，一心想立生身父亲为皇考，但朝中大臣认为这与礼法不合，必须尊朱厚照的父亲孝宗朱祐樞为皇考。此事争论了三年，嘉靖皇帝坚持皇命，群臣哭谏力争，嘉靖皇帝发怒，为此廷杖杖

死十多人，下狱一百多人。这就是有名的“大礼仪”事件。严嵩奉命改换墓碑和碑文之后，感到这是个讨好皇帝的好机会，就上奏逢迎说：“老天很照看陛下，改题碑文时候，灵风习习，仿佛神灵来到了面前，四周祥曦散彩，群鹤集绕，此等祥兆，表明兴献皇帝是上天应允了的。”嘉靖皇帝正担心群臣不服，见到严嵩的奏疏，自然高兴，表扬严嵩十分“忠赤”。严嵩一看皇帝这么看重自己，又如此爱听奉承话，回家连夜赶写一篇《幽风七月诗讲章》，借讨论诗词文学，对嘉靖皇帝大加颂扬，进呈御览。嘉靖皇帝平生最喜欢人家对他歌功颂德，一看严嵩这么合自己的心意，马上任命他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

严嵩当了礼部尚书之后，继续施展他的拿手好戏，不断写诗作赋，凭空颂扬嘉靖皇帝的“功德”。皇帝十分愉悦，让人把严嵩的诗赋存入史馆，以备将来修史用。不久，严嵩细心地将嘉靖皇帝设计钦定的一些礼仪和谕旨等集录成书，作为国家正式典章，以便让嘉靖皇帝朱厚熜能流芳百世。中国的皇帝，不管自己政绩如何，却都有一种历史感，总记挂着他死后别人会怎么看他，都想在历史上留下美名而不要骂名。嘉靖皇帝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政绩，他要流芳百世，当然需要严嵩这样的好吹鼓手了。

吹鼓手的本领还不止于此，严嵩还特别用心写青词。青词是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的斋醮天神的奏章表文，一般要用骈俪文体。嘉靖皇帝嗜好女色，弄得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只好求助于道教，每日斋醮，以求长生不老。当时斋醮需要献上青词，那些削尖脑袋以求升官的人便投皇帝所好，竞相呈献青词，其中不少人因此升官。严嵩的青词写得极好，好就好在颂扬上天的时候，同时颂扬嘉靖皇帝。严嵩见嘉靖皇帝笃信道教，自己也装成信仰道教，在家中设立道教教室，供奉玄像，还把皇帝赐给自己的香叶冠笼上轻纱，显得更加虔敬。嘉靖得知甚喜，提升严嵩为武英殿大学士，进入

内阁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内阁是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后逐渐形成的辅政机构。全国各地的奏章都汇集到内阁，由内阁几位大学士讨论决定怎么处理，将处理意见写在一张小纸条上连同奏章一起送皇帝审阅。严嵩每次处理奏章都要细细揣摩皇帝对此将如何考虑，然后才写上自己的意见。所以嘉靖皇帝见到严嵩写的小条子，都有“正合朕意”之感。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严嵩升任谨身殿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成为内阁“首辅”。

严嵩深知嘉靖皇帝脾气古怪，高兴时可以让你飞黄腾达，气恼时会撤你的职，因此他必须小心谨慎地运用心机，玩弄权术，以取得皇帝高度信任，保障自己的权势和利益。嘉靖皇帝不同于大老粗出身的朱元璋，他读过许多儒家经典，是个知识分子。儒家文化重视虚伪的道德伦理，因而只有那些符合儒家道德规范、外表恭谨廉正温驯的人，才会受到信任和重用。因此许多大奸臣在“得志”之前都要学会逢迎和“韬晦”，装得谦恭仁爱和廉洁。至于在权势既得以后是怎么回事，那就另作别论了。严嵩熟读经史，深谙此道。在他官尚小、取得嘉靖皇帝信任之前，他刻意表现“廉洁”。他知道皇帝和百官尽管都爱财，但表面上却都崇尚廉洁，耻于言利；只有等和嘉靖皇帝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关系之后，才能开始做他的以权谋私的生意。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皇帝自己过生日时加赐严嵩“上柱国”的称号。这仅是一个荣誉称号，严嵩却坚持不受，他对皇帝说：“‘上’之一字，非人臣所宜居，明开国之初，第一功臣徐达也只授左柱国，以后再未设过。皇帝即使加特恩，臣子也不敢受。乞皇帝不置此官，以昭臣节。”嘉靖皇帝听了此话，更加坚信严嵩对自己的敬重和赤诚，认为他是个一心为国、不争个人名利的大忠臣。以后有人说严嵩揽权，皇帝再也不相信了。曾有一个御史上疏弹劾严嵩柄政揽权，嘉靖皇帝一气之下将这位御史投入了监狱。严嵩还故意为